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

——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邓新航¹ 龙红²

(1.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2.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关键词:隋朝;民众;佛教信仰;造像题记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4-0087-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409

自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东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大为盛行。目前对于唐代佛教发展演变的诸多方面,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然而对于国祚短促的隋朝,学界多将其当作入唐的过渡期或准备期来看待,因此有关隋朝佛教发展的细节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发掘。

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概括来说,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皇室贵族、高僧大德等信众群体的关注较多。如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隋朝”部分,涉及的主要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崇信佛教的系列举措^[14-9];杜斗城和吴通《隋代独孤皇后与佛教关系述论》一文爬梳大量文献史料,对独孤皇后与佛教的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系统考察^[2]。二是对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信众群体虽有一定关注,但往往和唐朝信众一并考虑。如李晓敏《世情与佛理——隋唐佛教造像题记研究》,以隋唐时期佛教造像题记为核心史料,探讨了隋唐民众进行佛教造像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由此而反映出的一些社会问题^[3]。以上论著虽对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作了弥足重要的论述,但是对普通民众佛教信仰的考察尚不充分,对直观生动反映他们主观心愿与精神心态的造像题记的深度挖掘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造像题记这一文献视角对隋朝民众佛教信仰作深入考察,以此再现其时广大民众的宗教生活状况。

收稿日期:2021-03-30

作者简介:邓新航(1988—),男,重庆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宗教艺术与艺术考古。

龙红(1967—),男,重庆人,博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出站博士后。研究方向:艺术史论与艺术考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宗教美术史》”(17ZDA237)。

一、造像分布：民众信仰空间的地域性

自隋文帝杨坚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以来,佛教文化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佛教也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近年,我们对分散在各种材料之中的隋朝佛教造像题记作了初步收集和整理,目前共寻得 203 则。从年代来看,这批题记主要集中于隋文帝杨坚在位的开皇、仁寿年间,占比 80.79%;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大业年间则大幅减少,占比仅 18.23%。从造像类型来看,这批造像有石窟、金铜、汉白玉、造像碑等,其中尤以石窟和金铜造像最受民众欢迎,分别占比 31.53% 和 30.54%;此外,造像碑和汉白玉造像也占有较大比例,分别为 14.78% 和 14.29%。

从地域看,隋朝佛教造像题记的分布很不均衡,南方地区仅四川发现一则,其余均集中于北方中原地区,数量最多的是山西和河北,其余依次是山东、陕西、河南和甘肃等地(表一)。不同地区在造像时间、类型、题材等方面各不相同。

表一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的地域分布

地点	山西			河北				山东			陕西		河南			甘肃	四川	不详	
造像类型	金铜	石窟	其他	金铜	石窟	汉白玉	其他	金铜	石窟	其他	金铜	造像碑	其他	金铜	石窟	其他	石窟	石窟	
数量	17	24	11	15	6	27	2	7	21	4	6	17	7	10	11	3	6	1	8
小计	52			50				32			30		24			6	1	8	
合计	203																		

一是山西地区。该地区的造像题记数量最多,同时保存有金铜、石窟、造像碑等多种造像类型。纪年最早的是开皇元年(581)由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人出资雕凿的平定开河寺摩崖大龕^[4],最晚的是大业九年(613)杨郎造观音铜像^[5]。从信仰对象来看,释迦和观音题材最为突出。据统计,隋朝有 31 则释迦造像题记,其中就有 14 则出自该地区。从造像时间来看,有半数以上的题记集中于开皇前期。究其缘由,一方面应是该地区北齐佛教信仰盛行的延续;另一方面,隋朝立国之初,为防御突厥入侵,晋阳(今太原)被隋文帝列为军事重镇,并派其子杨广为晋王。杨广在当时信奉佛教,出于政治目的和统治需要,他必定会在此地大力发展佛教事业。

二是河北地区。该地区的造像类型以汉白玉石和金铜为主,尤以前者最为突出。汉白玉石造像流行的中心区域在曲阳,即古代定州的中心地带。据统计,隋朝 29 件纪年汉白玉石造像,其中有 26 件出土于此地。李静杰和田军将这种独具地方风格的造像流派称为“定州系白石佛像”,指出其始刻于北魏晚期,东魏后期、北齐、隋代盛极一时,唐代逐渐衰落^[6]。汉白玉虽不属玉石,但却具有玉石纯白无瑕、温婉润泽等特点,同时还兼具玉石高贵品德、身份尊贵的象征,将其雕刻为佛像,正与佛陀高尚、庄严神圣的精神气质相契合。从信仰对象来看,该地区特别流行双身观世音和双身思惟菩萨题材,这是该地东魏、北齐相关信仰兴盛的延续。

三是山东地区。该地区的造像类型以石窟为多,主要集中在济南和青州,几乎全为开皇年间所造,这也是在东魏、北齐佛教兴盛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纪年最早造像是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的开皇三年(583)金铜佛像,最晚为同遗址出土的大业四年(608)造像碑^[7]。从信仰对象来看,据刘凤君统计,山东北朝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和弥勒^[8];但隋朝有变,除观音继续流行外,另一个兴起的题材是阿弥陀佛,这可能与该地高僧道绰、真玉等大力宣扬西方弥陀净土有关^{[9][212]}。譬如云门山石窟的造像题材几乎全为阿弥陀佛,并且多是女性在家信徒为亡夫造像追福^[10],据此推测这可能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造像

活动。此外,北朝晚期的山东地区还流行卢舍那佛信仰,但隋朝少见,可见民众的信仰对象又发生了一定转移。

四是河南地区。该地区的造像类型以石窟和金铜为主,前者主要集中出现在大业晚期,后者则集中在开皇年间。最早的纪年像是该地区出土的两件开皇元年(581)铜像^[11],最晚的是大业十二年(616)龙门摩崖小龕^[12]。整体来看,该地区隋朝的佛教已大不如北魏早中期那样兴盛,这可能与武泰元年(528)河阴之变给当地佛教活动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有关。自那以后,河南地区只有一些小规模造像活动,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大业二年(606)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隋朝后期该地区民间佛教信仰逐渐兴盛起来,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以平民群体为主的邑义造像和小型摩崖龕像的集中出现。

五是陕西地区。长安是隋朝都城的所在地,统治者诸多复兴佛教的政策,往往从这里开始实施。因此,长安作为当时全国佛教艺术中心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该地区比较突出的现象是金铜和石窟造像较少,但大型造像碑的数量却很多。据统计,隋朝一半以上的造像碑都发现于该地区,且多为民间团体的邑义造像。造像碑的大量出现,实与皇室贵族对佛教的大力推崇有关。郝春文指出:“自500年至周武帝下诏灭佛(574年)的70多年间,北方几乎每年都有佛社从事造像、造塔等活动。”“但在周武帝灭佛期间(574-579年),北周统治区内再也没有发现佛社活动的材料。”^[13]可见,长安地区隋朝邑义造像碑的再度兴起,应是隋文帝复兴佛教最为直接的反映。此外,从题记内容来看,该地区官员造像较多,并且多次出现“愿国祚永隆”“愿帝□祚永隆”等寓示国家昌盛的政治信号,于此暗示他们的造像行为实则是一种忠君爱国的表现。

二、造像供养：信众与造像组织形式的多样性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14]1099},可见当时佛教并不独为统治阶级所专享,而是普及到下层社会,从而形成信众的多样性特征。根据造像题记对供养人身份的描述,我们将其分为平民、僧尼和官员三类。同时,现以5年为一个时段将供养人身份进行统计并绘制成表(表二)。

表二 隋朝佛教造像供养人身份

	平民 A	官员 B	僧尼 C	AB	AC	BC	ABC	不详	小计
581-585	33	4	2	0	2	0	3	4	48
586-590	32	5	3	1	4	0	0	2	47
591-595	23	3	0	3	0	0	0	1	30
596-600	17	0	1	0	0	0	0	2	20
601-605	15	0	1	0	0	0	0	1	17
606-610	14	1	2	1	1	0	0	1	20
611-615	3	2	0	0	0	0	0	5	10
616-618	2	0	0	0	0	0	0	1	3
年代不详	2	0	0	0	0	0	0	6	8
合计	141	15	9	5	7	0	3	23	203

从上表看,隋朝供养人以平民最多,共有141则,占造像总数的69.46%;其次是官员,共有15则,占比7.39%;最少者为僧尼,仅9则,占比4.43%;还有不同身份者之间的合作造像,占比7.39%。

不难看出,中国平民因为数量大、分布广,历来都是佛教造像活动的主要群体。隋朝民间造像活动

颇为兴盛,据唐代法琳《辩证论》卷三载,仅仅是隋文帝时期,全国上下共雕造大小佛菩萨像 106580 躯,修治故像 1508940 余躯,缮写经论 46 藏、13286 卷,修治故经 3853 部,建造佛寺 3792 所^{[15]509}。如此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必然有大量平民参与其中。

总体来看,平民造像集中在隋文帝时期,发展趋势是 595 年前数量较高,之后逐渐减少,至 610 年骤减。造像数量的突然减少,应与隋炀帝对佛教多次采取限制的政策有关。据唐代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僧行篇》载:

隋炀帝大业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礼。”^{[16]280}

此举当然遭到释明瞻^{[9]936}、释僧凤^{[9]449}等不少高僧的强烈反对,但效果并不明显。后大业五年(609)裁汰僧侣、融并寺塔等限佛政策对佛教的影响更大。据宋代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法运通塞志》载:

(大业)五年,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道,寺院准僧量留,余并毁拆。^{[17]362}

于此可见,隋炀帝远不如隋文帝那样佞佛,这与《辩证论》的记载相符。在隋炀帝时期,仅铸造新像 3856 躯,修治故像 101000 躯,这个数量还不及隋文帝时期的 4%。因此,隋朝后期造像数量的大幅减少,也就不足为怪了。

与平民造像相比,官员与僧尼造像的比例较低,两者均不及平民造像的十分之一,这也从侧面显示出隋朝佛教所具有的深厚的民间性和世俗性等特点。这两类人群的造像也大都集中出现在 581 年至 595 年之间,之后少有造作。由于官员的经济实力较强,故那些体量大、造型美的造像碑和石窟成其首选,或许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他们对佛教的倾情崇奉。僧尼单独造像的情况较少,而是多与他人合作,因他们具有较强的佛学修养,故在合作中多起着指导和组织具体佛事活动的作用。

隋朝民众佛教造像的组织形式多样化,除个体出资外,还有二人或多人的合作形式,具体情况统计如下(表三)。

表三 隋朝民众佛教造像组织形式

造像组织形式	个体造像	合作造像				
		家庭合作	邑义合作	平民与官员合作	平民与僧尼合作	平民、官员与僧尼合作
数目	104	28	15	5	7	3
小计	104				58	
合计				162		

由上表可知,隋朝个体造像所占比重较大,至少一半以上的造像为个体发愿所造。个体造像以平民居多,他们的目的简单实在,或为家庭成员造像兴福,或愿自身健康长寿。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官员或僧尼单独造像,如开皇十八年(598)比丘尼情□为自身造无量寿像^{[10]11},开皇四年(584)顺阳郡翊军将军□树为亡妻造阿弥陀像^{[18]270}等。

隋朝家庭中的成员大都为虔诚的在家信徒,当需要向佛陀寻求心理慰藉时,他们总是合作造像,这不仅满足了共同的造像诉求,而且还节约了造像开支。平民家庭如此,官员家庭也不免其俗。这种依亲缘关系组成的造像组织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夫妇合作,多以丈夫为主,妻子为辅,约十余例,如济南玉函山第 18 龛:

开皇九年九月五日,傅朗振共妻邹为亡息雅儿敬造释迦像一躯。^[19]

二是兄弟姐妹合作,其目的多为已亡父母追福,如张氏兄妹造像:

大业二年九月廿三日,佛弟子张志迁、弟志通、妹英连等,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牟尼像

一躯。^[20]

三是妻子与祖姑、儿子、儿媳和孙女等数人,发愿为亡夫、亡息造像:

夫冲元虚家,□□□□应迹难寻之者□,是以铸金树木,以表圣容。然今佛弟子清信女雷香妙减割家珍,为亡息敬造石像一躯。其功以就,愿亡者生无,见在获庆,又愿□帝祚永隆,三宝常续,法界众生,等成正觉。开皇六年岁次丙午九月廿一日功讫。亡夫柱国、参军党文表,像主雷香妙、亡息思炽、炽妻夫蒙贵资、孙女默女。祖□前部郡同官令天标、祖姑雷合姬、祖姑夫蒙伏花。^[21]131-133

此外,还有丈夫与儿子、儿媳为亡妻、亡母造像:

开皇元年九月九日,佛弟子张世兴为亡妇造观世音石像一躯,息仕□、息仕元、息仕亮、息仕高、□妻□、元妻□、亮妻□、高妻□。^[22]

除了亲缘关系的合作外,还有一种“拟血缘群体”的合作^[23]。这类群体有可能是不同民族、不同姓氏,但却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造像诉求而合作的,这在邑义造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邑义造像在北朝晚期曾十分流行,但北周武帝灭佛后却突然沉寂,隋文帝复兴佛教后又再度兴起。隋朝邑义造像多见于造像碑中,尤以陕西地区为多,目前共发现 12 件。邑义造像的规模不等,少则十余人,如河北磁县赵王庙石窟第 6 号龕,为开皇六年(586)台又与陈宰集、陈宰政等十人的合作造像^[24];多则六、七十人,如药王山博物馆所藏“合村老少造像碑”,为大业二年(606)夫蒙洪达等六十七人的合作造像^[25]127-128,但大多数在四十人左右。这种规模还表现出同姓造像和依地缘关系临时组成邑义造像的特点,譬如药王山博物馆所藏开皇二年(582)“弥姐显明造像碑”和开皇六年(586)“弥姐后息造像碑”,其成员以“弥姐”姓氏为主^[25]114,118。

邑义造像的成员较为复杂,既有造像仪式的引导者僧尼、地位较高的官员,又有普通平民。从题记内容来看,这些佛教组织参与者的称呼多样,较为常见的有都邑主、维那、邑师、都化主、香火主、开明主和邑子等。不同称呼的地位和角色也各不相同,邑主为总负责人,维那是副首领,化主负责劝人布施,邑师则是佛社内的法师^[26]。邑义造像的组织者多为当地信佛的官员、有名的高僧或豪强乡绅等,如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开皇元年(581)造像碑,其都邑主是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鹾觚令李显^[27]。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邑义组织都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随着造像活动的结束,这个临时性的佛教团体就随之解散。当需要再次造像时,民众又可重新组成新的邑义,所以我们能在同一区域不同时间的造像碑上看到相同的供养人姓名。

三、造像题材:民众信仰对象的集中性

造像题材是民众信仰对象的直接反映。据统计,除去那些字迹难辨或直接省略题材的造像题记,隋朝佛教造像的题材多达十余种,但集中者主要有五种,余下几种则仅有少量信众(表四)。值得一提的是,表四中的 21 例单尊菩萨造像均有题记,惜未言明其尊名。但从造型特征来看,当为观音菩萨,因为在一般信众眼里,菩萨也可指代观音,故在题记中常将“观音”二字省略。此外,表中的 6 例双菩萨造像,从其形象特征可推知均为双观音造像。

表四 隋朝佛教造像题材

题材	释迦佛	阿弥陀佛	弥勒佛	太子思惟	七佛	卢舍那佛	三十五佛	观音	单尊菩萨	双菩萨	双思惟菩萨	双观音
数目	31	19	8	5	3	2	1	32	21	6	7	2
总计	137											

一是观音题材。若加上单尊菩萨、双菩萨和双观音造像,则观音题记多达 61 则,占造像题材总数的

44.53%,可见观音信仰在隋朝流行最广,且不受地域限制。观音造像的供养人以平民为主,因此,那些体积小、造价不高、便于携带,且易于为家庭供奉的金铜观音像最受欢迎。平民供奉观音的目的简单实在,多为家庭成员平安祈福或为已亡亲属造像追福。为亡者追福是“净土型观音”在隋朝开始被民众逐渐接受的信仰实践表现,换言之,观音也开始具有独立接引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职能^{[28]346-356}。

观音信仰在隋朝之所以能有如此广泛的信众群体,一方面是因为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印度观音信仰相关的经典文献基本上已经输入中国^{[29]303-325}。随着观音经典的大量传译,观音能拔苦救难的现实性格逐渐被人们熟知并接受,以至于《观世音经》在当时“小儿童子皆能诵之”^{[9]1174}。同时,民众在南北朝时期也大量雕造观音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统治者和高僧大德们对观音信仰的大力弘扬,以及观音灵验和传说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布。值得一提的是,在开皇年间,虔诚信众还在摩崖或石板上刊刻与观音相关的经典,如《观音经》《高王观世音经》^{[30]13}等,这不但加强了观音信仰的影响深度,而且扩大了其传播的空间范围。

二是释迦题材。作为佛教偶像崇拜的教主,释迦一直都是信众的重要信仰对象。据统计,隋朝释迦题记有31则,占造像题材总数的22.63%。这些释迦像绝大多数都是石质造像,尤以石窟为多,甚至还有一处石窟中的绝大部分窟龕都造释迦像的情况^[31],说明释迦信仰在彼时彼地应有大批虔诚信徒。民众镌造释迦像的目的是祈愿亡者或生者“速登正觉”,早日成佛,这是信众崇佛的最终追求。

此外,我们在两则释迦题记中还发现其与弥勒信仰的混同:一则为济南玉函山石窟第5龕:“……敬造释迦像一躯并二菩萨……一切法界众生,龙华三会,愿登上道。”^[19]二则为南响堂山第1窟内小龕:“……敬造释迦像一区……龙花三会,俱登正觉。”^{[18]263}“龙华三会”本指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成道的三次说法,这种释迦信仰与弥勒信仰在观念上的混淆,可能是时人对两种信仰在教理上认识不充分所致。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正是中土信徒创造性的体现。他们并不是海绵吸水般地简单地全盘接受,而是经过自主的选择来编织其信仰,表达其心愿”^{[32]117}。

三是阿弥陀佛(含无量寿佛)题材。隋朝阿弥陀佛信仰后来居上,其造像数量仅次于释迦,明确题记共有19则,占造像题材总数的13.87%,绝大部分也为石窟造像。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教主,其国土是人们向往的理想天国。但自公元2世纪弥陀信仰传入汉地以来,至南北朝时期,相较于释迦、弥勒、观音而言,该信仰发展缓慢,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缺乏接受弥陀信仰的现实环境和文化思想有关。至隋代,该信仰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并被各阶层人士普遍接受。一方面,皇室贵族对其信奉有加。如隋文帝文献皇后十分热衷于西方净土信仰,生前曾多次发愿愿死后往生净土世界;受高僧智顗的影响,隋炀帝也是一位虔诚的西方净土信仰者,如他曾在“并州造弘善寺,傍龙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15]509}。另一方面,不少高僧如灵裕、慧远、智顗、吉藏等对西方净土理论的注疏和弘传也做了不懈努力,因而发展和壮大了该信仰的群体队伍。此外,弥陀信仰的修行方式容易操作,简便易行,无疑也扩大其受众范围。

四是思惟菩萨题材,包括单身和双身两种形式。隋朝共发现有关题记12则,占造像题材总数的8.76%,而且全为曲阳地区所特有的汉白玉石造像,其地域性特征很强。从图像特征上看,这种造像均为半跏趺坐,呈菩萨思考状。思惟菩萨在东魏、北齐时期就颇为流行,隋朝延续了这一造像传统。据侯旭东统计,该像主要流行于530年至569年间,发展趋势以540年至549年为鼎盛,此后衰落^{[32]140-142}。这个说法似有不妥,北朝之后,该像对民众仍有较强吸引力,它继续在河北地区流行了一段时期,入唐之后才迅速衰落。值得注意的是,隋朝民众对思惟菩萨的称呼有“思惟”“双思惟”和“太子思惟”,尚未发现北齐的“龙树思惟”,因此,隋朝思惟像表现的应是悉达多太子出家前的姿态。

五是弥勒佛题材。隋朝弥勒题记不多,仅有8则,占造像题材总数的5.84%,可见弥勒信仰在隋朝的信众较少。其实这种趋势早在北朝晚期就已显示出来。侯旭东指出:“弥勒造像与崇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盛而衰的发展过程,转折点分别在460年与530年前后。”^{[32]125}换言之,大致从530年左右

开始,弥勒造像的比例逐渐减少,时间越靠后,弥勒净土逐渐被弥陀净土所取代。依据不同经典,南北朝的弥勒形象主要有两种:早期以菩萨装交脚弥勒为主,突出的是弥勒上生信仰;晚期以佛装弥勒为主,弥勒下生信仰成为主流。从图像特征上看,隋朝弥勒全为佛像,其菩萨形象消失,显然是下生信仰的艺术表现。此外,与小型金铜观音像不同的是,隋朝弥勒以中大型石窟造像为主,石窟开放性的空间便于信众的礼拜供养。塑造弥勒像的目的不只是为家庭成员祈福,而是希冀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法界众生都能获得佛佑,广被福祉,如济南玉函山石窟第2号龕:

开皇五年岁次乙巳七月丙辰朔七日壬戌,佛弟子孙□太、妻夏树敬造弥勒像并一菩萨,为帝主、诸官、七世师僧父母、见存眷属、法界众生,有形之类,咸同斯福。^[19]

总之,隋朝民众流行的信仰对象从多寡主次看,依次为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其中观音信仰尤为突出,其他如卢舍那佛、七佛和三十五佛等题材偶有出现,影响不大。在这些造像题材中,思惟菩萨和卢舍那佛为区域性信仰。若与南北朝时期所流行的题材相比,隋朝民众的信仰对象确有较大改变。据统计,北朝流行题材依次为观世音、释迦、弥勒、浮图塔、卢舍那和无量寿佛等^[32]119-120。不难看出,观音和释迦在隋朝继续流行,阿弥陀佛和思惟题材后来居上,而弥勒和卢舍那佛题材则渐趋衰落。

四、造像对象:民众信仰祈愿的家庭性

隋朝佛教信仰已经广泛渗透到民众现实生活和感情之中,造像活动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因此造像题记便是最有依据考察推知其世俗家庭生活境况的文字资料。

隋朝民众为谁而造像?据初步分析,民众造像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这当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使然,“家族主义和特殊主义伦理即使在大动乱的时代也持续地影响着中国人”^[33]34。或许,这与大乘佛教教导普世的伦理和家庭之外的解脱的教义存在一定冲突,但受中国儒家道德伦理特别是孝道的深刻影响,以信众家庭为中心的佛事活动在当时确已形成一种“中国化”的社会风气,这显然与印度佛教信仰强调个人解脱是不同的。

由于隋文帝对佛教的大力扶持,以家庭为单位参与佛事活动蔚然成风,具体造像祈愿,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为父母造像,既包括已亡父母,也包括健在父母;既有同时为双亲造像,也有单独为父亲或母亲造像。发愿为父母造像在民众的佛教供养活动中占有很大比重,除去那些残缺难辨的题记外,我们统计出约50则造像题记之内容,明确表明为父母而造,尤其是为已亡父母造像追福。追福风气的普遍,似为传统祖先祭祀方式的巧妙改变,标志着佛教深深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与儒家倡导的孝道异曲同工,当是对传统孝道的大力弘扬^[32]309-315。如山西平陆出土一尊圆雕佛像:

开皇三年岁次癸卯八月丁卯朔八日甲戌,佛弟子张留通为亡父母及一切众生敬造像一躯,弟供祭。^[22]

二为配偶造像,也多为亡者追福。就古代中国社会而言,妇女婚后以夫家为主家在观念上可说是天经地义之事,当丈夫因某种原因离世之后,形单影只的她们往往会通过造像活动来表达对亡夫的切切思念。比如青州云门山第1号窟内的小龕:

大隋开皇十年岁次庚戌三月八日,像主□楞□为亡夫李三造无量寿一躯供养。^[10]11

又如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力士像右侧的一个龕像:

蜀郡成都县募人□□□季子赞□□兴,敬为亡夫、见在母、兄弟、自身得早还相见,造观音像一躯并及六道四生,同沾斯福,大业十二年四月廿五日。^[12]

亦有丈夫为亡妻造像,以此表达内心哀思,如北响堂南区第2号窟东壁的一个龕像:

大隋大业七年岁在辛未九月癸未朔廿四日丙午,李君□□为亡妻敬造阿弥陀像一部,资益亡者,远离三□,超登彼岸,常闻正法,又愿见存父母眷属,恒蒙福佑,当来见在,值善值佛;上为皇帝陛下、臣僚百官,下及蠢类含生,同沾斯福。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18]276}

三为子女或孙辈造像。在医疗事业尚不发达的古代,多子多孙就意味着家庭兴旺、家族繁衍。当儿孙因疾病或战乱不幸离世时,父母辈多造像追福以减轻丧子之痛,如开皇九年(589)傅朗振夫妻二人为亡息雅儿造释迦像一躯^[19],开皇十二年(592)兰伏回为亡息造双观音像一躯等^{[34]157}。祖父母对孙辈有一种天生的爱护,这在佛教造像活动中也有一定体现,他们通过造像祈求孙辈健康平安,比如枣庄出土一件金铜造像:

开皇十一年正月廿三日,佛弟子许珣为孙子长寿造像一躯。^[35]

又如河北河间出土一件金铜造像:

开皇十一年八月八日,刘仲渊为孙女造观音像一躯。^[36]

四为自己造像。为确保自身平安和长寿康健,不少民众还为自己造像以期获得诸佛、菩萨的护佑。比如山西寿阳出土一件金铜造像:

开皇廿年二月廿三日,佛弟子武纂敬造观世音像一躯,为己安泰,元诸□厄,又为七世常生净土,现有存眷属□与善会□,上为皇帝国祚永隆,为法界有形,俱升上道。^[5]

又如南响堂第6号窟窟外北侧的一个龕像:

维大隋开皇八年四月己亥廿一日己酉,佛弟子王辉儿敬造阿弥陀佛像一躯并二菩萨,愿现身延年,无诸苦患,□□眷属,生生世世,值遇□□。又愿七世先亡及法界苍生同沾此福,所愿如是。前明威将军金乡县。^{[18]270}

还有的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叔姑等造像。如大业年间佛弟子□生为亡兄造观音像一躯^{[37]11},以表对兄弟的思念情谊;开皇四年(584)钳耳神猛为亡姑、亡姑父造四面像,愿他们托生西方净土世界^{[38]52-53}。

五、造像祈愿:民众信仰心态的功利性

隋朝民众为何而造像?民众的造像对象与其造像祈愿是密不可分的,造像祈愿是时人主观心愿真实而生动的表达,这些明白朴素的祈愿是未加任何修饰和掩盖的。由于民众的造像对象不一,因此造像祈愿也较为多样,但就其主要者而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世俗生活祈愿和佛教信仰祈愿^{[32]177}。无论何种祈愿,它们都是民众信仰心态强烈功利性的体现,也即民众期待通过造像这一单纯而实在的真诚行为去实现现世或来世的各种祈愿。

世俗生活祈愿指的是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心渴盼,上可至国家兴盛、天下太平,下可及家人健康长寿、幸福平安,其功利性、实用性的宗教信仰意识极为鲜明。譬如,有的人祈愿家庭平安幸福,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一件金铜造像:

开皇五年十月十日,佛弟子吴士良为家口平安告像一躯。息乾子、息季宁。^[39]

有的祈求佛陀保佑家人或自己疾病痊愈,比如曲阳修德寺出土一件汉白玉造像:

开皇六年正月廿一日,邸仕询为亡母敬造玉象一躯,愿使阿耶患得早除,故立碑记。^{[34]139}

又如山西寿阳出土一尊金铜造像:

开皇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佛弟子程长洛为父母造像一躯,愿己身眼目精明,法界达佛。^[5]

此外,古代战乱频繁,生死未卜,还有不少士兵发愿造像以保平安归家,比如山西寿阳出土一块金铜发愿文碑:

大隋大业九年九月八日,佛弟子丰川府□杨郎将□永贵征辽平安,在辽西郡敬造观世像一

躯,上为皇帝陛下圣化无穷,干戈永息,又为亡过七世父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现存眷属乃法界有缘,俱同斯福。^[5]

又如河北正定出土一尊金铜造像:

仁寿三年三月八日,郭全安去开皇十二年身充岭南防领,□平安得还家,敬造官世音像一。^[40]

甚至,还有人整天担惊受怕,但知崇善抑恶,便皈依三宝,造释迦像一躯祈福:

开皇十二年岁次壬子十月癸酉朔廿八日庚子,清信佛弟子王贤良,谨心悚惧,知善可崇,知恶可舍,良苦空无,常仰凭三宝,敬造释迦来像一区。愿弟子上从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永离三徒,众善咸辉,见存之者,普获斯善。^[41]

相对于现实生活贴切的世俗祈愿来说,那些佛教信仰祈愿似乎显得虚无缥缈。但即使是在这些带有宗教义理色彩的佛教祈愿里,也还是透露出民众对佛教信仰的强烈功利性。

一是祈愿及时成佛。此种祈愿出现次数较多,虽表述不一,有“一时作佛”“侍时成佛”“愿登上道”“皆登正觉”和“速登正觉”等,但信仰实质却相同。祈愿成佛多与造释迦像有关,不论生者或亡者,现世或来世,崇奉佛法并能成佛应是信众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大多数人对于如何成佛似乎缺乏足够认识,祈愿成佛多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如开皇九年(589)张威造释迦像一躯,“上为国主七世父母,生身父母、边地众生,俱登正觉”^[31];开皇十五年(595)刘伐等二十八人造释迦像一躯,愿“众生俱时成佛”^[42]。偶尔也有信徒认为诵读大乘佛经可以俱时成佛^{[18]271}。

二是祈愿龙华三会。与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的弥勒菩萨居兜率天宫为众说法的上生信仰不同,隋朝弥勒信仰的内涵有了实质性的大转变。弥勒下生阎浮提,于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度众的下生信仰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推崇,如开皇四年(584)李惠猛与妻敬造弥勒像一躯并二菩萨,“上为皇帝陛下,诸师、父母、法界众生,龙华三会,愿登上道”^[19]。前文已述,隋朝民众祈愿龙华三会所造之像并不一定就是弥勒佛,还可能是释迦,这种看似含混的状态,其实是民众信仰“非系统性与随意性”^{[32]110-116}的表现。

三是祈愿托生西方妙乐净土。此类祈愿的对象多为亡者,也即希冀亲人死后能够前往庄严美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如开皇十一年(591)卢谊兄弟等为亡父母造四面石像:

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三月癸未朔廿八日庚戌。夫元冲虚家,妙趣理幽,应迹难寻,悟之者罔。是以大都督、县平望卢谊兄弟等,念亡考比生育慈恩,敬造四面石像一躯。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见在眷属安吉,恒修功德,帝祚永隆,三宝常续,又及法界众生,蒙此功德,等成正觉。^[43]

西方净土信仰在隋朝有大批信众,但民众对该信仰内容的认识可能还不够深入,他们多数人仅把西方净土当作死后归宿,为的是死后不堕地狱,免遭六道轮回之苦,但净土信仰的其他方面,或许一概不闻。从造像题记上不难看到这点,隋朝19则阿弥陀佛题记,尚未发现有发愿托生西方净土的语句。其实,隋朝以前亦是如此,日本学者佐藤治水就此曾指出:“崇奉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与祈愿西方净土,北朝结束前的大部分时间在信徒头脑中亦是互不相干的两种观念。”^{[44]86}这种造像题材与祈愿内容不一致的做法,既是民众对佛教观念意识淡薄的流露,同时也是民众信仰颇为随意性的体现。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观音与西方净土也在发生微妙联系。大业九年(613)□永贵造观世音像,但他却发愿“七世父母托生西方妙乐国土”^[5],可见隋朝除较为常见的“救难型观音”外,“净土型观音”也在悄然兴起。

六、结语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虽然文字内容简单,表达方式模式化,但语词中却不时流露出民众佛教思想、精神信仰和诉求心态的真情实感,而这些展现民众群体意识与个体心灵世界的文字内容,无论是在正史

中,还是在僧传中,都是极为鲜见的。无疑,造像题记为我们打开了得窥隋朝民众精神信仰世界的一个鲜活窗口。

综上所述,通过造像题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五个特点:信仰空间之地域性显著、信仰阶层与造像组织形式之多样性鲜明、信仰对象之集中性突出、信仰祈愿之家庭性浓郁和信仰心态之功利性强烈。五个特点其实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具体地说,从造像题记的空间分布来看,民众佛教信仰活跃的区域是山西、河北、山东、陕西、河南等中原北方地区,南方仅四川等少部分地区有崇信活动。这可能与南陈与北方的持续战乱有关。隋朝佛教信仰及其造像活动遍及社会不同信众阶层,除个体出资供养尊像外,还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拟血缘关系”团体合作也相当普遍。民众的崇奉对象也在不断变动消长,总体而言,观音和释迦流行最广且较稳定,阿弥陀佛的影响逐渐扩大,并逐步代替弥勒佛信仰,思惟菩萨则为河北区域性信仰。正是受到中国儒家传统孝道文化的深刻影响,民众造像的目的是为其家庭核心成员祈福或追福,显示出他们宗教意识中极强的功利性心态。

[参 考 文 献]

- [1]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 杜斗城,吴通. 隋代独孤皇后与佛教关系述论[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 [3] 李晓敏. 世情与佛理——隋唐佛教造像题记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 李裕群. 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J]. 文物,1997(1).
- [5] 晋华,吴建国. 山西寿阳出土一批东魏至唐代铜造像[J]. 文物,1991(2).
- [6] 李静杰,田军. 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3).
- [7] 李少南. 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1986(9).
- [8] 刘凤君. 山东省北朝观世音和弥勒造像考[J]. 文史哲,1994(2).
- [9] (唐)道宣. 续高僧传[M]. 郭绍林,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0] 赵呈呈. 驼山、云门山隋代佛教石窟造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3.
- [11] 刘东亚,李国灿. 近几年来河南征集一批有纪年的铜佛像[J]. 中原文物,1986(1).
- [12] 王振国. 龙门隋代小龕初探[J]. 华夏考古,1998(1).
- [13] 郝春文.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J]. 历史研究,1992(1).
- [14] (唐)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5] (唐)法琳. 辩证论[M]// 大正藏:第52册.
- [16] (唐)道宣. 广弘明集[M]// 大正藏:第52册.
- [17] (宋)志磐. 佛祖统纪[M]// 大正藏:第49册.
- [18] 赵立春编著. 响堂山石窟艺术[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 [19] 唐仲明. 济南玉函山隋代摩崖龕窟造像[J]. 中原文物,2003(1).
- [20] 杨亨利. 山西平陆县出土一批隋唐佛道铜造像[J]. 考古,1987(1).
- [21] 曹永斌. 药王山石刻重勘记略[M]. 油印稿,内部资料,1982.
- [22] 卫斯. 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J]. 文物季刊,1993(4).
- [23] 邵正坤. 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J]. 学习与探索,2010(1).
- [24] 赵立春. 河北磁县赵王庙隋代摩崖造像[J]. 文物春秋,2007(6).
- [25] 宋莉. 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D]. 博士学位论文,西安美术学院,2011.
- [26] 郝春文. 东晋南北朝佛社首领考略[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
- [27] 秦明智. 隋开皇元年李阿昌造像碑[J]. 文物,1983(7).
- [28] 李利安. 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 [29] 李利安,等. 四大菩萨与民间信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0] 赵洲. 河北省曲阳县八会寺石经龕[M]//石窟寺研究: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31] 张弛. 山西省和顺县沙峪摩崖造像调查[J]. 敦煌研究,2016(4).
- [32] 侯旭东.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增订本)[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33] [美]芮沃寿.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M]. 常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34] 故宫博物院编. 你应该知道的200件曲阳造像[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 [35] 李锦山. 枣庄市出土梵文铜镜和北朝铜佛像[J]. 考古,1986(6).
- [36] 王敏之,何占通. 河北河间出土隋唐鎏金铜造像[J]. 文物,1991(2).
- [37] 王普军. 长治地区隋唐佛教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08.
- [38] 李域铮编著. 陕西古代石刻艺术[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 [39] 卢永琇.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隋开皇年造像[J]. 文物,1991(2).
- [40] 樊子林,刘友恒. 河北正定收藏的一批早期铜造像[J]. 文物,1993(12).
- [41] 庞文龙. 岐山县博物馆藏隋代石造像[J]. 文物,1991(4).
- [42] 杨忠敏. 彬县出土隋造像碑[J]. 文博,1988(2).
- [43] 韩伟,阴志毅. 耀县药王山佛教造像碑[J]. 考古与文物,1996(2).
- [44] [日]佐藤治水. 北朝造像铭考[M]//刘俊文主编. 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Buddhist Faith in Sui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Buddhist Statue Inscription

Deng Xinhang¹ Long Hong²

(1. 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Tow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buddhist statue inscriptions in Sui Dynasty is the real reflection of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individual aware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203 statue inscriptions, we concluded that the peoples' buddhist faith in Sui Dynasty has fiv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First is regional, the peoples' buddhist faith is mainly center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areas, especially Shanxi and Hebei, and different regions have its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Second is diversity, the belief class is broader, most of them are civilians. And believers' organizational form is also diversity, family cooperation and consanguinity group are quite common. Third is concentricity, the popular theme of them are Avalokitesvara, Sakyamuni Buddha, Amitabha, Siwei-Bodhisattva, Maitreya Buddha and so on. Fourth is family, the core object of the peoples' prayer is their family members. At last is the utilitarian, pray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utility of people's buddhist faith.

Keywords: the Sui Dynasty; folk; the buddhist faith; statue inscription

[责任编辑:刘力]